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新南社: 文学转型的青果

孙之梅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 南社解体, 新南社成立。新南社有着自觉的文学转型意识, 立志改造旧南社为新南社, 把旧文学的南社改造成为新文学的新南社。然而由于新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叶楚伦等人对南社成败做不到理性的反思, 因此导致南社解体的政治一元论继续贯彻于新南社的“大政方针”之中, 组织方式上也承袭了南社的同学、同乡、家人的网络特点, 终致新南社一无所成, 既不能持守旧文学, 又赶不上新文学的步调, 充其量只是一个聚集国民党官员、社会贤达的短期文化俱乐部。

关键词: 新南社; 文学转型; 社团宗旨; 组织方式

作者简介: 孙之梅(1956-), 女, 山西太原人, 文学博士,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504(2008)01-0114-06 收稿日期: 2007-03-05

文学转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在梳理文学史时, 往往对拒绝转型、转型缓慢或者转型不成功的事例重视不够, 用力不足, 甚而一言以蔽之曰: 保守落后, 跟不上时代潮流。反过来则比较重视那些激进先锋的现象, 甚而给以不恰当的评价。南社的解体和相继成立的短命的新南社就是五四前后文学转型中耐人寻味的两个范例。南社可以说是拒绝转型的典型, 而新南社则是自觉转型的典型。对前者几乎众口一词批评其落后, 对后者则大加称赞。柳亚子就说: “无论如何, 新南社对于南社, 总是后来居上的。”^{[1](P251)} 新南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团? 应如何对其评价? 新南社的成立停顿对文学转型的认识有何启示作用?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南社发起人对南社解体的反思

1923 年底, 《南社丛刊》二十二集出版, 历时数十年、社员千余人的南社终于寿终正寝。南社骤然解体, 许多人感到意犹未尽, 吸取南社保守

陈旧的教训, 意在文学转型的新南社因之而起。

《南社纪略》说, 在新文化运动中, 柳亚子和南社的一些人也想跟上这一潮流, 决定利用南社的基础, 改造南社为新南社。也就是说把旧文学的南社改造为新文学的新南社。1923 年 9 月 10 日叶楚伦发表了《新南社发起宣言》, 10 月 14 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颁布了《新南社条例》, 10 月 19 日柳亚子发表了“大政方针”《新南社成立布告》。新南社本是准备大干一场的, 《条例》规定出版《新南社月刊》、《新南社丛书》, 体裁用语体文。但新南社只存在了一年有余, 搞了三次雅集, 出版了一期月刊, 丛书则根本未见踪影, 就虎头蛇尾地自行消失了。

新南社是在南社的基础上产生的, 可以这样说, 新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叶楚伦等人对南社成败、南社解体反思达到的程度就是新南社的生长点。柳亚子说, 叶楚伦对于改组南社为新南社的计划给予“诚挚的鼓励和很热烈的推进过”^{[1](P90)}, 那么叶楚伦是如何总结南社和规划

新南社的呢？其《发起宣言》道：

南社的发起，在民族气节提倡的时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纳的时代，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那一点，新南社孵化中应该向国民高呼声明的。南社在提倡民族气节以后，引纳世界潮流以前，中间经过几次困厄，被人指摘处也不少；然而这些都是新南社孵化的动机，发起新南社的，非但不愿引为耻辱，并且将深自庆幸。南社是应和同盟会而起的文学研究机关，同盟会经几度改革以后，已有民众化的倾向，新南社当然要沿袭原来的使命，追随着时代，与民众相见。南社在民元以前，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因为要提倡民族气节，不知不觉形成了中国文字的交换机关。新南社是蜕化文字交换，而蕲求进步到国学整理和思想介绍的。^{[1](P91)}

叶楚伦在三层比较的语义中，首先说南社和新南社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前者是提倡民族气节的时代，后者是引纳世界潮流的时代；其次说南社被人指责，新南社会吸取教训，引以为鉴；其三说南社是提倡民族气节时代的文字交换机关，后者是引纳世界潮流的文字蜕化组织。叶楚伦这一段文字用今天人的审美眼光看实在不敢恭维，但其意思还是明了的。不过，叶楚伦对南社的时代和新南社的时代的认识都是不准确或者说不全面的。南社产生的时代不仅仅是提倡民族气节的时代，同时也是西学大肆东进的时代。和南社同气相连、同根共生的国学保存会就是在“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反动社团出现的。而新南社出现的时代也不能简单用“引纳世界潮流”来概括。我们知道，胡适为了推进白话文学，一方面重视介绍西方文学思潮，一方面又重视对本土传统文学的整理和重新估价，于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并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白话文学史”的研究。此外叶楚伦过分强调南社提倡民族气节而简单化了南社。南社从酝酿到成立，从发展到解体，文学始终是其主要性质，提倡民族气节只是它的政治倾向而已。说南社“不知不觉形成了中国文字的交换机关”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南社始终就有明确的文学意愿。叶楚伦这种矫情的言辞后面反映的是言说者政治本位、蔑视文学的心理。

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在总结南社沉沦上要比叶楚伦深刻具体得多，指出南社“渐渐堕落”的原因有三：一是“袁世凯做了总统，我们认为中国无事可做。二次革命失败，社中激烈分子更牺牲了不少，残余的都抱着‘妇人醇酒’消极的态度，做的作品，也多靡靡之音，所以就以‘淫烂’两字，见病于当世了”。二是洪宪皇帝，筹安劝进，

很有旧南社的分子。可是在炙手可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开口，等到冰山倒了，却热烈地攻击起来……提倡气节的一句话，却有些说不响嘴了。三是旧南社人太多，鱼龙混杂^{[1](P101)}。柳亚子的反思应该说还是平实而深刻的。如承认民国后南社的作品确实存在“淫烂”的病端。但是在几年前柳亚子是做不到这一点的。1916年胡适《答梅觐庄书》说：“诸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2](P369)}任鸿隽说文学改革“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还有诗歌改革。继之否定了当时诗坛的同光体和南社，说：“即以诗论，老者如郑苏蠡、陈三立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烂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2](P377)}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寄陈独秀》则进一步批评南社不及同光体：

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烂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者作，此所批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堪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贗鼎耳！

南社从成立伊始就要做“海内文学之导师”，在文坛树革命之旗帜，革同光体之命，取而代之。但折腾了十几年后，在新派人物眼里，南社竟然和同光体是一丘之貉，且被指斥为尚不及同光体，这不能不引起南社人的愤怒。柳亚子、成舍我、姚锡均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然时过境迁，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时竟然认同了“淫烂”的批评。到1938年写《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一文时，就更加平和，反思也更全面，说：“追求南社没落的原因，一方面果然由于这一次的內讧，一方面实在是时代已在五四风潮以后，青年的思想早已突飞猛进，而南社还是抱残守缺，弄它的调调儿，抓不到青年的心理。”^{[1](P149)}

尽管如此，柳亚子的反思与叶楚伦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模糊混淆南社的性质，极力将其说成是一个政治组织。云：“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所以我们的提倡，就侧重在民族主义那一边，而民权、民生，不免疏略了一点。”^{[1](P100)}以南社的政治倾向代替其社团性质，将文学社团与政治党派混为一谈。如此的运思，应该说是柳亚子一以贯之的做法。我们不妨考察柳亚子的文学批评，始终贯穿了缠绕不清的政治霸权，给辩论者上纲上线，让对方就像秀才见了兵一样无理可讲。1911年写的《朝寄尘诗序》把宋诗派与“废官退吏”放在一起论述，至于言辞犀利地詈骂：“而今之称诗坛渠率者，日暮途穷，东山再起，曲学阿世，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

狗……其尤无耻者，妄窃汝南月旦之评，撰为诗话”。这里骂的是郑孝胥和陈衍。说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伦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敢望”^{[3](P256)}。宗宋与宗唐不仅是诗学门径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1917年柳亚子反驳胡先时没有涉及到学理诗理，还是就诗论诗。那么胡先为何没作任何反应？我认为胡先感到无法交流的尴尬，因胡氏评论的是同光体诗，而柳亚子批评的是宋诗，同光体虽然与宋诗有一定的联系，但这是文学史上的两回事。论题不一，自然无话可说。后闻野鹤发表诗话为陈衍辩护，还批评道：“特质美未学，目空一切，西江诸集，咸加诋议，坐是复不免有执螳螂以嘲龟龙之诮矣。”^[4]柳亚子一直以自己的国学根底而自负，立志要取代陈三立、陈衍、郑孝胥而为文坛盟主。闻野鹤的话真是如芒刺背，他连续写了《诤野鹤》、《再质野鹤》，耿耿于怀的就是上面的几句话。柳亚子为了论辩的高屋建瓴，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郑、陈为清朝遗老的政治身份，闻氏怎么敢冒为亡国遗民辩护之罪名？倾向宋诗派的又冒出一个不知死活的朱玺。柳亚子斥朱玺为“说同光体为亡国之音，不仅是清朝的亡国之音，还要来亡共和国，岂能容之？指责同光体之诗表达‘穷愁抑郁，苦语满纸’，‘叹老嗟悲，忧国如焚’之情为亡国士大夫之情，朱玺‘为国民之民，何苦为彼亡国大夫作辩护耶？’”柳亚子认为：“人各有真性情，唯性情不同，各如其面耳。亡国大夫之性情，与共和国民之性情，天然不同。今之鼓吹同光体者，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大夫之性情，宁非荒谬绝伦耶！”^{[3](P473)}原来学唐学宋关系到诗人是前清之民还是共和国之民，共和国之民就应该学唐，因唐诗乃黄钟大吕之音，适合表现民国的开国气象。《诤野鹤》云：“国事至清季而极坏，诗学亦至清季而极衰。郑、陈诸家，名为学宋，实则所谓同光派，盖亡国之音也。民国肇兴，正宜博综今古，创为堂皇雋丽之作，黄钟大吕，朗然有开国气象。何得比付妖孽，自陷于与万劫不复耶！其罪当与提倡复辟者同科矣。”^{[3](P457)}经过柳亚子这么一番解释，宗唐既关乎一个人的政治角色，还是一种政治使命。民国之民就应学唐，亡国遗民才学宋；民国之民就应该创作“黄钟大吕”式的诗歌，亡国之民则为清朝遗老之奴，是噓亡清之焰。如此论诗，实在过分霸道。社外人士终于发表不平之议。王无生《不平》一文就指出：“论诗之道，不以时代，不以身世，不以富贵贫贱，不以同异。”^[5]柳亚子又在《偕剑室拉杂话》逐一反驳，说到为什么学唐时说：“今既为民国时代矣，自宜有代表民国之诗，与陈、郑代兴。岂容噓已死之灰，而复燃之，使亡国之音重陈于廊庙

哉！”^{[3](P495)}柳亚子从文学史上总结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民国时代确实应该有民国之文学，坚定地相信宋诗的时代之后应是唐诗的时代。他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同光体一样，都是在寻求古典诗歌的出路和变化，但是在古代文学的价值体系内打转转。在诗学上占不了优势，则借民国、借政治立场来为自己强势。如此论诗，确实使人心有余悸。柳亚子在动辄上纲上线一点得时代之先机，数年之后，就是国民党内部诋毁不同意见的人，最有力的撒手锏就是给对方戴上反革命或资本主义走狗的帽子，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立于天地之间。朱玺在《四谿诗话》中不无忧惧地辩解道：“妄人论诗，最好牵涉时事，又好污蔑善良。以人论诗，犹有可说，若强说顺逆，试问有何具体可断？岂妄人之诗，中华民国宪法上已定为国诗耶？”^[4]

柳亚子主张诗歌学唐，应该说是他少时教育和地域文学传统所致。《五十七年》说到他母亲把一部唐诗三百首读得滚瓜烂熟，传授给他。柳亚子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天才，但对母亲的影响还是感戴的。柳亚子的第三位老师陆阮青教他读《杜甫全集》，还是清初朱鹤龄的注本。陆老师要求柳亚子学一首背一首。晚年柳亚子说“这眼光确是非常伟大，而对于我诗学的初步训练，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劳”。除了少时的教育外，吴江与相距不远的松江在明清是复古派的重要产地，复古派的文学主张追随前后七子，杜甫及初盛唐诗是主要的宗法对象。地域的诗学系统与柳亚子从小读唐诗三百首与《杜甫全集》的路数若合符契。事实上每个人的诗学道路都有一定的家族、地域或人缘的因素。在新文化运动来临的前夜，学唐与学宋只是一种诗学惯性，而根本不存在是非曲直，但柳亚子非要给不同诗歌传统的认同加上政治标签，实有狐假虎威之嫌。我们知道柳亚子是一个真诚的人，尽管他一生都在努力追赶时代潮流，但他的文学批评则始终没能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很传统，理念又很激进，他始终企图以政治解决一切问题。1936年柳亚子不无歉意地回顾“朱、柳之争”，又不无自我辩护地说：

我和鸳雏的争辩，发源于宋诗问题……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亡友陈勒生烈士曾经说过，满清的亡国大夫，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他们倘有才有才具，有学问，那么，满清也不至于亡国了。满清既亡，讲旧道德的话，他们应该殉国；不然，便应该洗心革面，做一个中华国的公民。而他们却不然，既不能从黄忠浩、陆钟琦于地下，又偏要以遗老孤忠自命，这就觉得进退失据了。勒生对于他

们是深恶痛绝的,而我便很同情于勒生。[1](P149)

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对人性人情的蔑视以及对文化复杂状态的无知。这就是南社主流人士的思维方式,由不满意清朝,“株连”到了宋诗、学宋诗的清朝诗人、学同光体的本社诗人。

以上我们分析叶楚傖、柳亚子的《新南社发起宣言》和《新南社成立布告》,他们对南社的性质、南社解体的反思和认识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没有捕捉到五四运动后寻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文化精神,这就决定了新南社虽意在将旧文学的南社转变为跟上新文化运动步调的新文学,但最终必然是由于宗旨陈旧、思路模糊、运作手法随意而自生自灭。

二、新南社文学转型失败的原因

在反清反袁的政治使命凸现为文化包括文学主题的时代,南社文学应和了时代的要求,使其在意识形态占据了革命文学的阵地。但在五四前后,南社处于由依附于政治、政党的文学社团向单纯的独立的文学社团转变关头,柳亚子论诗逻辑上的荒谬决定了南社无法展开正常的文学讨论,南社的转变也就无从进行。原有的社团凝聚力不复存在,而社团又不能进行功能上的转变,解散是它唯一的出路。柳亚子的这种政治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又贯彻到新南社宗旨的制定和对新南社的期待中。《新南社布告》云:“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这就是关于旧南社转变为新南社后的“方针大计”。如果不是“提倡民众文学”这一句空洞的蹈袭之语,让人很难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柳亚子如何期待新南社?

《南社纪略》把南社成立的背景进行类比:“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依归的;新南社的成立,则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在契机上可说是很巧妙的了。”也就是说南社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新南社是改组的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南社依附于排满革命的同盟会,新南社依附于倾向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南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它在文学的近代转换上柳亚子从未论及,而得意的是南社中成员有多少做了官员。对于新南社,柳亚子也是如此思路。他给曹聚仁的信说到这一问题,首先很赞同曹聚仁所说的“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只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派的文治”。进而发挥道:“陈英士先生也是南社的老友,那么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可说是文经武纬,都在南社笼罩之下了……我开着顽笑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接着又比较新旧南社:

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像已经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就可以举出廖仲恺来。汪是诗的,廖则是散文的。然廖先生不死,也许近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局面,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吧。那时候,或者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派的政治,也未可知。[1](P251)

一贯称南社是同盟会的宣传机关,是和同盟会做犄角的,至此,反宾为主,不说南社是同盟会的文学,反说同盟会的政治成了南社的政治。汪精卫是同盟会的代表,竟然也成了南社的代表。同盟会中很多人有过参加南社的经历,他们最终做了民国的官员,是因为参加同盟会组织的革命活动成就的,而不是因为填写了一份加入南社的入社书、或参加了南社雅集、或在《南社丛刻》上发表了几首诗文。柳亚子把英雄欺人的荒谬思路同样推及到新南社,新南社自然也不是要跟上新文化运动的步调,把古典文学情结很重的南社改造成尊重个性、提倡理性批判精神的新文学的南社。如此的政治强势主义,更不会做恪守古典主义,坚守传统文化阵营的“落伍者”。新南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生长点又在何处?新南社的运思方式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有文人气味的文化联合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或学术团体。

柳亚子的激进主义还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一个文学社团,必定有自己的文学赖以生长的学术基石。新南社究竟是恪守传统,还是吸纳西学?这就涉及到新南社的第二个宗旨。叶楚傖《发起宣言》在混淆南社性质的心理基础上确定新南社宗旨:诚实而充分地向国内输送世界思潮和国学整理两个方面。柳亚子对前者没有明确表态;对于后者,则坚决反对,说:“对于第一条整理国学,我现在却有一点怀疑,国学有整理的价值吗?整理好了,能有好影响给思想界吗?我很赞成某某先生‘牛粪里寻香水’的一句话,觉得恐怕徒劳而无获呢”[1](P102)。我们知道柳亚子早年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其国学程度自诩甚高。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柳亚子领悟了一个时代精神:求新求变是思想文化界的先进之道。这一年4月创办了《新黎里》杂志,发刊词上发表了“日新又新”之说;10月的《新南社成立布告》就由民国前国粹派的一个成员、民国后擅长旧体诗的南社领袖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者。后在《答某君书》和《给许士豪底信》中进一步阐述他反对整理国学的观点,前者云:

承询文艺与新文艺之判,质言之,即文言文与语体文耳。仆为主张语体文之一人。良以文言文为数千年文妖乡愿所窟穴,纲常名教之邪说,

深入于字里行间,不可救药,故必一举摧其壁垒,庶免城狐社鼠之盘踞……整理国学之说,创于胡适之辈。陈独秀先生则以为求香水于牛粪,徒劳而靡所获。仆今日瓣香,颇宗独秀,曩时发起新南社,以整理国学列诸条文,犹不免为适之辈所误……仆近皈依社会主义,以为世界各国,终当成一大联邦,世界各民族终当混合为一大民族。但能乘时猛进,不为时代之落伍者,断无亡国灭种之忧。至于韩文、汉语,又决无永久保存之理,他日世界语盛行,当与英、俄、德、法诸文,同当淘汰。[6]

后者云:

我以为要做旧诗,必不能不多读古人的作品,而古人的作品内,所谓“富贵功名之念,放僻邪侈之为,阿谀奉迎之习”,差不多开卷即是,那又如何是好呢?所以我对于旧文学,第一嫌他内容太坏,而第二层是嫌它不容易做,不容易懂,就是不容易民众化。[7](P44)

事实上,柳亚子的激进已非其时,五四以后数年间进入新一轮文化方向的拨正期。以梅光迪、任鸿隽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展开了和新文化在学理上的辩论。此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已在同一空间和时间构成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理论框架,而胡适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学术观念,开始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对自己文化主张的支援。柳亚子没有学理支持的几句空洞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话已毫无意义。

既然国学是“牛粪”,开卷即臭,柳亚子应该肯定引纳世界潮流,介绍西方思想作为新南社的方针大计。叶楚傖在《宣言》里说到“我们原有的伴侣和伴侣底知识读书力太单薄了,所以十分诚意和别的团体的伴侣合作,协力进行”。这话说得很中肯,南社的成员在输入西学方面的确无优势可言。更重要的是柳亚子对这一观点也不全部认同。新文化运动中,柳亚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在《佈告》里有了“鼓吹三民主义”,“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的“新南社精神”,YT《答某君书》说自己“皈依社会主义”。新南社停顿后,柳亚子赋《空言》诗,云:“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其实信奉什么主义与新南社的性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文学,也需要文化学术,新南社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不至于昙花一现。柳亚子《南社纪略》说:“从第三次聚餐会以后,就没有举行聚会,新南社就无形停顿了。因为我已经直接参加中国国民党的斗争,无暇再做外卫的工作。新南社的生命很短促,不过它的意义却是值得纪念的。”显然,柳亚子的新南社意

不在学术文化,更不在文学,只要能直接参加政治,社团就弃之敝屣了。

我们再看新南社的组织方式,仍是散发着名士气的吃馆子、照相一套的雅集。加入的成员多国民党官员,决定了新南社不可能在思想文化和文学学术上有所建树。新南社如果持续下去,最好的结果无非如柳亚子所说“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的政治”,新南社还保留了南社以亲友、同乡、家人为网络的成员特点。柳亚子一家五口,夫人子女全部成为新南社成员。如此发展成成员,人数剧烈膨胀,一年余的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了二百三十余人,又一次蹈了南社人员太多太滥的覆辙。人数多在南社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而在1924年以后则没有任何文化意义。此时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学院派成为学术争论和文化建设的主角。《学衡》与胡适的论争依托的就是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论争者均是学有专长、具备中西教育背景的学者,用梅光迪的话说:真正的学者,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就训练而言,有师承,有专长。就其精神而言,严格标准,唯真是求[8]。论争没有功利的企图和政治目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彼时学院派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性质模糊的新南社尽管人数众多,团体庞大,与之相较无非是乌合之众。

三、新南社的启示

新南社大张旗鼓地成立,雄心勃勃地发展社员,却悄无声息地消亡,其短命的历史对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甚微,然而却对后人考察五四后文化领域的浮躁激进、剖析百年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启示意义的范本。

近代以来,我们被动挨打,割地赔款,每一个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寻求摆脱贫弱、拯救危亡的途径,思想文化翻云覆雨,着急浮躁的情绪几乎笼罩了整个近现代。从梁启超、严复到五四,进化论的引入,加剧了这种着急浮躁的情绪,唯新唯变,唯激进唯先锋成为一种时代通病。柳亚子少年时受《新民丛报》影响,后又接受排满革命的影响,组织南社活动,成为民国革命文学阵地的名人。新文化运动到来,柳亚子面对蜂拥而来的新思潮,同样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新南社成立布告》说到:“新文化运发现之初,文言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

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这里涉及到“最初”“中间”“最后”三个时间概念,“最初”应该是1918年左右,“中间”是1920年左右,“最后”应该是1922年。这年4月,柳亚子在故乡黎里创办了《新黎里》半月刊,刊物名字中的“新”字当然是效法《新青年》中的“新”字。其《发刊词》阐释“新”字:“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日新又新之说也。潮流澎湃,一日千里,吞氧吐碳,舍故取新,苟非力自振拔,猛勇精进,欲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乌可得哉?”至此,柳亚子敏锐而明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先进之道,《新南社成立布告》又呼应道:“末了,再引几句旧话来作我的帮衬,就是‘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见于《汤之盘铭》的,我们大家要有这种精神才好,不然,恐怕新的变旧,又要归于淘汰之列了。”从这些话里我们感到柳亚子不甘落伍、不愿被淘汰的焦躁恐惧心理,新南社就是这种心理结出的果实。正是由于如此焦躁,新南社的发起人柳亚子、叶楚伦都来不及坐下仔细斟酌社团的宗旨,以至于成立伊始的《宣言》、《布告》都意见不能统一,又谈何思考有建设性的文学或文化主张。

近代文学的演进尽管不可以化约为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的附着物,但是却显示了与社会历史紧密联系的脉络:从经世致用的文学关怀到康梁的文学工具,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从理论、实践两方面澄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导引文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意味着半个世纪来的文学之路的拨正。周作人1920年1月《新文学的要求》,1921年6月《美文》两篇文章正是这方面的可贵探求,显示了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深度。在这种文学背景下我们看新南社的运思、宗旨及组织方式对于南社的承袭,不能不瞠目其新瓶子装旧酒。由此可见,文学的转型,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社会转型达到临界点后,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催生下,文学转型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事实上在焦躁着急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后它要复杂得多。新南社有着明确的文学转型意识,但柳亚子、叶楚伦不仅没有厘清两种意识形态的意识,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采取政治强势主义,把文学社团依附于政党和政治运动,新南社焉能不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之下,接受了部分新思想皮毛后结出的青果?

参考文献

- [1] 柳亚子.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 胡适.留学日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3] 柳亚子.磨剑室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4] 闻野鹤.惺惺诗话[N].民国日报,1917-06-24.
- [5] 王无生.平不平[N].中华新报,1917-08-10.
- [6] 柳亚子.YT答某君书[J].南社丛刊.
- [7] 柳亚子.书信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8] 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J].学衡(4).

[责任编辑 杜桂萍]

New Nanshe: Green Apple in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SUN Zhi-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Nanshe is disseminated, and the New Nanshe is founded. New Nanshe is aware of a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iming at turning the old Nanshe into a new one and a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literature into a new one. However the lack of rational reflection of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is organization of the sponsors such as LIU Ya-zi and YE Chu-cang lead to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Nanshe—the monism—still existing in the “policy” of New Nanshe. The management of this organization still sticks to the network quality which just means a unification of schoolmates and townsmen and relatives. All these lead to the failure of it. It can not stick to old literature or keep up with new one. At most it is a short-lived cultural club for the Kuomintang official and social elites.

Key words: New Nans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im of the society; way of organization